

学术专论

“元初一清初”的历史想象与 清初北方士人对清朝入主的认识 ——以孙奇逢为中心的考察

桂 涛

〔摘要〕以江南为主场景的明清之际主流历史叙述认为，秉持“夷夏之防”正统观念的儒家士大夫，往往对北方异族统治抱持拒斥的态度。但是，这一解释模式难以对同样受儒学熏陶的北方士人在清初的行为做出解释。本文考察了清初活跃于中原的儒学家孙奇逢对其所处时代的理解，发现孙奇逢建立起一个“元初一清初”的历史想象。在孙奇逢的精神世界中，元初异族皇帝重用许衡、耶律楚材、刘因等儒学家，呈现出一幅崇礼右文的面貌。由此，与元初有类比关系的清初也被理解为重归于治的时代。在此基础上，孙奇逢的“出处观”也有了别样的意味。孙奇逢从势道平衡的角度考虑，“出”是实践儒家的道，“处”是保证儒家的道相对于皇权的优势地位，二者均是行道。

〔关键词〕明清之际 孙奇逢 历史想象 河南 河北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3)-03-0062-11

一、引论：“明清之际”的视域

截至目前，“明清之际”主流历史叙述，是以江南作为主要舞台展开的。以政权更替为核心的明清易代史，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以现代历史编纂方法撰写的第一部清代史——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全书48章，涉及鼎革的是24—27章，分别为“明国亡于流贼”、“北京迁都”、“明人恢复事业之悉败”（上、下）。从各章具体细目来看，主要叙述的史事，包括北京陷落、山海关战役、清世祖入北京、剃发令、弘光政权建立、清军南下、南明诸政权覆灭。^①整个叙述中，北方仅提及东北边境和作为京师的北京，接着就直接进入江淮一线，由此进入易代史的主场景——江南，再一路南下，直至缅甸。北方中原大地，几乎无法进入这一叙事的视野之中。萧一山《清代通史》为国人自撰的第一部章节体清史，对此段历史的叙述，在第二编第11—14章，题为“明国之覆亡”、“清人之入据中原”、“福唐诸王之偏安”、“桂王之偏安与郑氏之伟业”，叙述了明末“流寇”之乱、北京之陷、清人入关定都、剿灭“流寇”、南明诸政权与清代的对抗、郑成功江宁之役等主题，叙述仍然集中在南方。中原地区只在“流寇之剿灭”这一主题下“河

〔收稿日期〕2012-11-08

〔作者简介〕桂涛（1980—），男，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北京100084；guitao0121@gmail.com

① 参见稻叶山君：《清朝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北之大定与李自成之败逃”这个细目中出现，所占仅一页的篇幅。^①以江南为核心的政治史叙述，在最近出版的《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中，被推至新的高度。作者杨念群把江南作为形塑清朝政治风格的动力，指出，一方面“清朝合法性的建立实际上是对‘南宋—晚明’夷夏历史观的一种克服”，另一方面“清朝的一系列‘大一统’的行动合法性的确认，又恰恰是在江南士人的配合下才得以成功推行的”。^②

明清易代史之所以以江南为主要场景，是由于这一历史叙述兴盛于清末的革命运动之中，自始便与反满、建国纠缠在一起，江南士人的抗清史自然就成为此段历史的担纲者。如1913年印行的《明季痛史》，作者陈祖懿在弁言中说：“惟满洲虱入时，南方士夫，因立明藩，罹祸独酷。而孤臣遗老，百折不挫，前仆后继，知其不可而为之。挥鲁阳戈，衔精卫石，奋博浪椎，轻身一试，风起潮涌者，尤南士为多。故此回革命，发端两粤，溯源三湘，而收兹美果乎？”^③则清末的这场民族革命，其动力直可上溯到300年前。陈寅恪为《明季滇黔佛教考》所写的序也说：“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直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④则以滇黔一地叙述“明清之际”，所致意者，在为国土沦陷泰半，偏安西南一隅的国民政府，寻找合法性的根据。

以江南为场景的历史叙述，尚有另一种类型，只不过与上面所述的明清易代史问题意识迥异，呈现另一番风貌。这种叙述是以“晚期帝国”（late imperial）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为代表。这种历史叙述，试图在中国社会内部，探寻它自身向现代转化的可能性，叙述集中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技术变革、人口、贸易、商业、消费、市场、城市化、自治组织、社会网络等主题，如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2003）、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1994）、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2007）^⑤等等。之所以在江南展开叙述，是因为由生产、技术变革带来的贸易、人口的变化，进而社会变革的链条，在江南最有可能被观察到。因此，江南因其生产、商业、城市、消费而成为“明清之际”的担纲者。

最近，另有一派将观测点移向了北方。之所以在北中国展开“明清之际”的历史叙述，是因为他们相信，所谓欧亚大陆“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的共时性，并不表现在它的边缘（英格兰、江南），而是它的中心（内亚洲）。^⑥这个“早期现代”也不表现为贸易、商业、市场、城市等特征，而是军事革命、帝国拓展、殖民主义等特征。在“清代形成”（the Qing Formation）这个概念之下，濮德培（Peter Perdue）、米华健（James Millward）、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学者，将清代的形成，视为在欧亚大陆深处的草原中孕育出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同一历史动力还催生出土耳其、莫卧儿、俄罗斯等帝国。明清之易代，正是“早期现代”这个历史趋势的表现，是一个开放的、正在形成中的多民族帝国对一个封闭的、民族国家的胜利。^⑦

无论是占主流的以江南为核心的叙述，还是最近兴起的在“亚洲内陆”展开的叙述，间隔在北方草原与江南水乡之间的华北平原几乎都被忽略掉了。这是因为，在这个地区，缺乏上述几种历史编纂所叙述的主题。就政治史、思想文化史而言，清兵入关，迅速占据中原地区，随即南下对付南明政权，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在这个地区没有政治史想要看到的剧烈抵抗，也没有几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0—241页。

②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0、11页。

③ 转引自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④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5—236页。

⑤ 李伯重著作2003年由三联出版社出版；高彦颐著作中译本2005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巫仁恕著作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⑥ 此派吸收了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弗莱彻（Joseph Flecher）对亚洲内陆研究的成果。

⑦ 参见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下卷），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9年。

个思想文化史偏爱的遗民。对于经济—社会史、文化—社会史来说，中原在商品经济、城市化、大众文化等方面没有向历史学家展现变革的端倪。在“内亚洲”的视角下，这里并非历史动力所在，而是等待被征服的地区。甚至可以说，在上述历史编纂的视野中，中原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地区。

但是，河南、河北本身作为明清之际的一个历史动力，果真没有价值吗？本文以为如果我们从更为传统的中国历史编纂视角——即一个正统王朝建立出发，中原至少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征服中原，对于一个像清朝这样“夷狄”建立的王朝，在它建设正统王朝的征途上，毕竟是迈出了第一步。即便这一步缺少实质的意义，它至少也有象征意义。另外，中原几近传檄而定的原因何在？这需要地方士人的合作才能办到。又是什么力量促使地方士人采取合作的姿态？当然，通常我们会说军事力量威慑的作用。肯定的，暴力是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同样的军事力量，在江南却遇到了剧烈的抵抗。因此，我们还得从河南、河北士人自身的立场出发，去理解他们如何看待清朝入关所带来的变化，以及他们为何接纳了（至少默许了）这个“夷狄”建立的政权。

第二，河南、河北士人为清朝提供意识形态资源。清朝的意识形态是在克服江南士人的正统观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得到大量史实的支持。但是，清朝的统治者们又是从哪里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思想武器呢？陈名夏、冯铨等投降的高级官员那里，无疑是一个重要来源。畿辅、中州士人对变迁局势的历史定位，同样也是一个重要来源。诚如戴福士所言：“即便中原百姓有时对事件的建构在其他入眼中可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他们却依据自己的信念行事，从而为清朝的最终形成做出了贡献。因此，这些人的集体抱负、行动和期望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标准，以此来衡量清朝的成就。他们也许还使我们能将清朝政治置于一个更广泛的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模式之中。”^①

本文的写作目的是描述明清之际北方士人的面貌，让这一过去无法纳入“明清之际”历史编纂的群体，成为历史的担纲者。所采取的办法是，通过考察被誉为清初三大学士之一的孙奇逢对清朝的认识，重塑清初河南、河北士人对明清易代的感受。

孙奇逢^②（万历十三年〔1585〕——康熙十四年〔1675〕），字启泰，号钟元，直隶保定容城人。明清两朝屡屡征聘，坚辞不就，世有“征君”之称。晚岁，讲学夏峰，学者咸呼“夏峰先生”。本文所以选取孙奇逢作为考察对象，是出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孙奇逢在明清之际活跃于河南、河北，具有广泛影响力。明季，孙奇逢已是河北地方知名士人，更在党争中，因营救左光斗、魏大中等正派君子，而以“范阳三烈士”之一闻名于世。入清后，河北圈地，孙奇逢举家南徙，定居河南卫辉县的苏门。苏门时期，孙奇逢致力于著书立说、培养弟子，积极与河南地方士人建立联系，使苏门俨然成为中州的一个学术中心。其二，孙奇逢从顺治六年南迁时起就开始记日记，直至康熙十四年去世。这部日记，内容之庞大，即便在经历了二百年的破损、散佚，仍然留下长达36卷的残稿。这样，孙奇逢的日记，成为我们今天重建明清之际北方士人内心世界不可多得的宝库。

① 戴福士（Roger V. Des Forges）：《走向另一个唐朝或周朝？顺治时期中原人的观点》，载《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第91页。戴福士的这篇论文及其之后出版的论著（*Cultural Centra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ese History: Northeast Henan in the Fall of the Ming*, 2003），是我所见的为数不多的对明清之际中原士人的讨论。

② 孙奇逢生平，参见魏裔介：《孙征君先生奇逢传》（载钱仪吉：《碑传集》卷127，中华书局，1993年，第3741—3747页），汤斌：《征君孙先生年谱》（载《清初名儒年谱》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551—758页），《孙奇逢传》（载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传10，载《清代地方人物传记丛刊》1，广陵书社，2007年，第283—285页）。

二、“不独识宋元之际，且以见清明之际也” ——孙奇逢对清初的历史定位

康熙六年十一月，身处夏峰的孙奇逢，写信给他的学生王元鑑。在信中他说道：

窃思宋元之际，道在许子，因取《元史》读之。许子兴学，诸儒蔚起，指不胜屈。无令儿子辈录之，欲为一帙，不独识宋元之际，且以见清明之际也。目前之为吴、许者，当自不让前代。^①

王元鑑，字玉乘，定兴人，康熙二年举人、三年进士。^②孙奇逢从朋友那里听闻，王正为所在官局清闲，可以一意向学感到庆幸。于是，决定给他写信，规劝他不要把学问和做事分为两途。“此事（按：指做官）莫视之大难而有畏心，饥而食、寒而衣，不容姑待，一日用饮食之道也。”孙奇逢说道：“第就今日入官。设官必有事，我敬其事焉而已矣。作官必与人、与上大夫、与下大夫，各自有体，我忠焉而已矣。此等皆学问实际也，外事与人而言学，非孔门之所为学也。”当时，王元鑑正在哪里做官，我们已无从得知。不过，《大清畿辅先哲传》的小传中提到，康熙三年成进士后，“授中书”。则其时，他可能仍在做内阁中书。在给王元鑑讲这番道理之前，孙奇逢先举出宋元之际许衡的故事作例证，鼓励王元鑑向许衡学习。还告诉王元鑑，他正在读《元史》；并且说明这个阅读行为，是有强烈的现实指向的，即不仅仅是为了扩充宋元历史知识，更是为了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清明之际”。

两年后，在给友人魏象枢的回信中，孙奇逢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宋元之际，道在许子。……清明之际，道久矣，有所属矣。先生与柏乡公莫逆此事，不任还教谁任？^③

魏象枢^④，字环溪，号庸斋，蔚州人，崇祯十五年举人，顺治三年清朝首科进士。作为最早与新政权合作的汉人，魏的仕途颇为顺利。顺治朝历任给事中、都给事中等谏台官员。在顺治末年，因与陈名夏的关系，仕途受挫，随后辞官归里。不过，到了康熙朝，又被征召入朝，在户部、都察院、刑部等中枢机构任大僚。康熙八年，正是魏象枢辞官居乡期间。孙奇逢同样使用宋元之际与清明之际的类比关系，将魏象枢和柏乡公，比作许衡，似乎有劝谕魏再次出仕的意味。柏乡公，指的是清初另一位汉人高官魏裔介。

其实早在向王元鑑、魏象枢表达“元初一清初”的历史想象之前十年，孙奇逢就已经对魏裔介表达过这层意思。《题苏门图寄魏石生》曰：

予来苏门近十五年矣，空山无人，俯仰兴怀。魏子莲陆尝视予夏峰，携手泉源，登公和啸台，访康节安乐窝，元耶律、姚、许、窦诸先正栖迟寄寓遗址，眺望徘徊，辄有欲移家共晨夕之意。濒行，图苏门之胜，将归而贻石生先生，以当卧游。复谓予曰：苏门一席地，盖有元诸公化民成俗之区也。自先生至，止我、石翁尝驰神于苏山泉水之间。今对此图，如见先生矣。予闻之，憬然曰：石翁，盖当世之姚、许也。苏门烟水自萦，怀抱樵渔，犇犢之人，何足以辱意念哉？崔文敏有言曰：元有三儒，耶律晋卿之谏杀，许平仲之兴学，刘静修之不仕，三公固各有得也。予私谓：为静修易，为晋卿、平仲难。先生今日固为其难矣。维持世运，鼓舞来学，抚此图得无寄其寤寐之思乎？^⑤

① 《日谱》卷28，康熙六年十一月初五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第310页。

② 《大清畿辅先哲传》传11，有小传。《清代地方人物传记丛刊》1，第301页。

③ 《日谱》卷31，康熙八年四月初八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第354页。

④ 《碑传集》卷8有传，第186—194页。

⑤ 《日谱》卷17，顺治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第34页。

魏裔介，字石生，号贞庵，柏乡人。同魏象枢一样，也是顺治三年进士。当时，魏裔介已位居要津，在朝中任左都御史。孙奇逢的弟子魏一鳌来苏门谒师，向孙奇逢传达了魏裔介对他的仰慕。孙奇逢闻之，写下上面的文字，以回应魏裔介。孙将魏比作元初的耶律楚材、许衡，而以刘因自比。并认为从维持世运的角度而言，耶律楚材、许衡的任务要更为艰巨。

孙奇逢所表达的这个朝代类比关系，与我们通常所认识的不太一致。我们更多见到的是，将南宋与晚明、南明进行类比的情况。如有研究者就指出，清初江南士人沿袭了晚明结社唱酬、品题诗画、构园造林的行为，但其内涵的意味已大不相同，其中“或隐或显地藏有一个‘南宋—晚明’的心结意象”。通过“南宋—晚明”想象，江南士人建立起一个时间感，界定出当下所处时空的意义，并给自身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一个准确的定位。这个“南宋—晚明”的历史想象，通过“残山剩水”这个意象表达出来，抒发的正是江南士人对明朝覆亡的哀恸。^①

身居中原的孙奇逢，同样也到宋末元初这个历史时期去寻找界定自身在历史中所处位置的参照系。但是，相较于江南士人缔造出“南宋—晚明”想象，他则构造出“元初一清初”想象来理解他们的处境。而这个历史想象模式，究竟具有怎样的意味，关键在于孙奇逢是如何理解元初这个历史时期的。

孙奇逢尝说：“先正云：元有三儒，许平仲之兴学，耶律晋卿之止杀，刘静修之不仕，三人而已。”^②则三人深为孙奇逢推许，自不待言。从这句话来看，三人受推许的缘由，关键在“兴学”、“止杀”、“不仕”三点上。（这里只述许衡、耶律楚材二人，刘因放到下一部分中叙述。）

虽然孙奇逢屡屡提及许衡，但在《文集》和《日谱》中找不到专论许衡的文字。这可能与许衡的事迹，在当时的辩论语境中，早已为众人熟悉，达成共识，无需特别讨论有关。所幸《日谱》中留下了一些他读《元史》的笔记。以这些笔记为基础，再配合《元史》的记述，我们大概能拼贴出一幅孙奇逢所想象的元初图景，从而也能够窥见他对自己所处世代的认识。

《元史》卷158《许衡传》涉及兴学的有如下两事：

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枢为劝农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为京兆提学。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喜幸来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还怀，学者攀留之不得，从送之临潼而归。

帝久欲开太学，会衡请罢益力，乃从其请。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衡闻命，喜曰：“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乃请征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燾、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为伴读。诏驿召之来京师，分处各斋，以为斋长。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课诵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刚五常为生人之道。^③

前一条涉及地方士人的教化，事情发生在甲寅年，即1254年，当时的大汗还是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忽必烈受命管理漠南汉地。后一条则是至元八年（1271）的事，所针对的则是另一个群体——蒙古贵族。许衡教化所针对的这两个群体，在清初的孙奇逢读来肯定特别亲切。就地方社会而言，经历明季的战乱，地方社会早已满目疮痍，学宫被毁，儒生受辱，地方的学校需要重建，士人的日常教育也亟待恢复。许衡所为，无疑也是孙奇逢等经历过北方战乱的士人所想要做的。

① 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第20—32页。

② 孙奇逢：《为苏门交友序》，《日谱》卷35，康熙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第429页。

③ 《元史》卷158，中华书局，1987年，第3717、3727—3728页。

许衡教化所针对的第二个群体，则与清初情况尤为相似。像元代的蒙古人一样，清人亦是异族入主，并不谙熟于儒家的治理风格。许衡的例子，至少让孙奇逢看到了希望。不懂儒学的“蛮夷”，并非全无优势，其质朴风格，只要辅以适当的指导，亦能让他们成为儒家的信徒，使世道重归于治。因此，他才会那么积极地敦促他的朋友、学生出仕。

再看耶律楚材。在《跋耶律晋卿传后》中，孙奇逢描述了对这个宋元之际蒙古政权重要谋臣的认识，他说道：“今来百泉，游息公梅溪旧居之墟，再取其传而读之，益惊叹晋卿之为古大臣也。好生一念，淪洽于人。元季（按：此应为笔误）而生此人，斯世斯民之庆也。”^①耶律楚材是辽东丹王后裔，初遇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对他说：“辽金的世仇，我来帮你报。”耶律楚材却说：“我现在与金是君臣关系，怎么敢弑君呢？”此事载《元史》卷164《耶律楚材传》。从这段对话，大略看出耶律楚材的儒者风范。至于“止杀”，《耶律楚材传》记载了如下两个事例：

帝自经营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长吏，生杀任情，至掣人妻女，取货财，兼土田。燕蓟留后长官石林咸得卜尤贪暴，杀人盈市。楚材闻之泣下，即入奏，请禁州郡，非奉玺书，不得擅征发，因当大辟者必待报，违者罪死，于是贪暴之风稍戢。

壬辰春，帝南征，将涉河，诏逃难之民，来降者免死。或曰：“此辈急则降，缓则走，徒以资敌，不可宥。”楚材请制旗数百，以给降民，使归田里，全活甚众。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汴梁将下，大将速不台遣使来言：“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驰入奏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帝犹豫未决，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帝然之，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时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

第一条所关涉的是大乱之后地方社会秩序重建，第二条则是征服者所当采取的行为。这第二条可能尤为触动孙奇逢等中原士人的神经。明季，开封同样经历了攻防战，上演了一幕河决灌城、阖城殉焉的惨剧。对比蒙古人攻汴梁，“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真天壤之别。这也不得不逼使士人反思，夷狄一华夏、禽兽一人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

兴学、止杀、再到恢复地方秩序，一切迹象，都暗示元初是一个重归于治的时代。

康熙六年十月，也就是给王元镗写信前一个月，孙奇逢正在读《元史》，并在日记中摘抄了《元史》一些段落，所摘抄的主要来自卷153、164、189，从中摘录了杨奂、杨恭懿、萧□、同宽甫等人的传记资料。

（杨奂）以耶律楚材荐，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既至，招致一时名士与之议政事，一以简易为事，公私便之，时论翕然。^②

（萧□）世祖初分藩在秦，征侍藩邸，以疾辞。授陕西儒学提举不赴，省宪大臣即其家，具宴为贺。后累授集贤直学士、国子司业，改集贤侍读学士，皆不赴。武宗初，征拜太子右论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师。^③

（同宽甫）仁宗初，即其家拜国子司业阶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陕西行台侍御史赵世延请即奉元置鲁斋书院，中书奏先生领教事，制可之，后先来学者殆千数。延祐设科，再主乡试，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议大夫、太子左赞善召，入见东宫，赐酒慰问，继而献书历陈古谊，尽开悟涵养之道。^④

（杨恭懿）十一年，太子下教中书，俾如汉惠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张元智为

① 《日谱》卷6，顺治十二年五月初四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668页。

② 《日谱》卷28，康熙六年十月初三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第304页。

③ 《日谱》卷28，康熙六年十月初三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第304—305页。

④ 《日谱》卷28，康熙六年十月初七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第306页。

书致命，不得已乃至京师。帝遣国王和童劳其远来，帝亲询其乡里族氏、师承子姓，无不周悉。^①

孙所记录的这些儒者屡屡被元朝皇帝征召，且极为礼遇，专门派遣官员去敦请，以宾客之礼待之，不视为臣。从这些摘录中，看不出元初有任何野蛮的气象，相反，是一个少见的崇儒佑文的时代。

尤让孙奇逢致意再三的，是赐座一事。世祖诏杨恭懿修历，“当历成进奏日，诸臣方列跪，帝命先生及鲁斋起，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学汝者。’故终奏，皆坐毕其说。”孙感叹道，“盖异礼也！”有趣的是，孙奇逢并没有严格依据原文抄录。《元史》卷164，对世祖召见赐座一事是这样记载的，“是日，方列跪，未读奏，帝命许衡及恭懿起，曰：‘二老，毋自劳也。’”^②对照之下，发现忽必烈所言仅表达了“二老自安”这层意思，至于“是年少皆受学汝者”这层意思则很有可能是孙奇逢自己加上的。之所以这样做，或许是想将儒生提高到帝王师的位置，制造出一个道尊于势的场景。通过帝王之口道出，所欲表达的恐怕也是这道对于势的优先性，是得到历代帝王承认的。

这些摘抄，至少表达出了两层意思。其一，世道要恢复于治，必须依靠儒生所掌握的治理天下的知识。其二，由于元初帝王亟亟求治，厚待儒生，使得这个时代呈现出一幅治世的面貌。

相应于元初的蒸蒸日上，与之有历史类比关系的清初，在孙奇逢的眼中也有一幅山河日新的面目。虽然，在清朝的最初几年，孙奇逢因圈地，被迫离家，确实有过一段比较黯淡的日子。但当顺治七年抵达苏门后，他很快就从灰暗之中摆脱出来。与地方士人饮酒唱酬，寻访苏门名胜。当年五月初七日，当地士人曹滋甫、曹澄甫两兄弟，邀孙往游百泉，于泉北一亭，赏景小酌，但见“亭下波光日映，水草缥缈，若五色云炫人心目”。随后，众人又结伴登孙公和嘯台、访邵康节安乐窝。孙奇逢感叹道：“虽日就倾圯，然高人风致，自不可以劫数迁流，山灵应借二公生色。”^③日常所见景物，也生出一派祥和之气。如其诗《晨书触目示从游二子》所见：

吾家太行山之东，西南千里势愈雄。

腹背面目虽未熟，苏门烟景独称隆。

我憩薛楼已旬日，目之所触神已融。

大者龙蹲小虎踞，远近吞吐环无穷。

独喜珠玑百泉水，悠然派衍万壑通。

澄泓须眉立可鉴，鱼鸟忘机无事中。

男妇纷纷刈麦急，莲陂稻渚方肇工。

日夕香气竹风来，榴花烂熳火让红。

楼前植树棕与桐，楼虚四牖引清风。

遥望戴笠荷锄者，似无租赋扰其躬。

老夫坐此心自空，此乐愿与二子同。^④

此时，孙奇逢正住在薛楼。薛楼，正式的名称是望嘯楼，因楼与苏门名胜嘯台相对，又以所属当地士人薛行坞，俗称薛楼。孙奇逢有“倚楼遥望嘯台空，邂逅逃名大化中”^⑤一绝，即述此楼。百泉、鱼鸟、竹风、农夫割麦等等情形，一派清新，非太平盛世莫属。

在清初，有此眼见者，非只孙奇逢一人。顺治三年正月底，魏象枢在邸报上看到新朝将在二

① 《日谱》卷28，康熙六年十月初一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第303—304页。

② 《元史》卷164，第3843页。

③ 《日谱》卷2，顺治七年五月初二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578页。

④ 《日谱》卷2，顺治七年五月初八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579页。

⑤ 《日谱》卷2，顺治七年五月初十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580页。

月举行会试的消息，以为太平已至，“不觉闻鸡起舞”。于是，辞别母亲，匆匆上路。一路风尘仆仆，幸好赶上会试之期，于二月初五抵达京城，顺利参加了新朝第一科会试。“榜发，中三百七十五名”。^①

孙奇逢的弟子汤斌亦作如是观。汤斌在给好友的信中说道：“秦中近已大定，闽海又已廓清，楚蜀荡平应在指日，此番劫运既过，庙堂当有一番久安长治规模，非大贤不能任此。且难进易退，固士君子之节，而仕止久速，又有非可用人意见者。以先生今日所处，似西行在所难已。兵火之后，扶绥残黎，登之衽席，亦我辈快事，不知先生以为何如？”^②在汤斌看来，他们正处在一个“劫运”已过、治世将至的世代，像他和张沐这样的人，应当出来为世道的转换尽一份力。汤斌的父亲也是这样看待清初的，在汤斌顺治十六年辞官返家后，乃父颇有些欣慰地说：“我不幸蚤经家难，继遭寇变，盛衰感怀，骨月伤心，五十年中，言之令人欷歔。今幸叨恩盛时，汝以壮年勇退，我体气稍健，父子聚首，阅耕东皋，课读南轩，亦老年佳事也。”^③

睢州城西北角有古寺乾明寺，苏轼绍圣元年被贬，曾宿于此。崇祯十五年河决，大水由寺北堤口灌入，睢州旧城被淹，乾明寺亦没于水中。汤斌曾乘船过，见“蒲苇莲芡，一望无际，白鹭飞鸣，与渔歌相答，铁佛像斜立波涛中”，为之嗟叹良久。到顺治十七年，汤斌回乡时，河治地现，乾明寺已由僧真元募资修葺，城市也恢复往日的面目。汤斌见到：“寺东锦水沦涟，西则古城长堤，烟柳映带，南望雉堞楼台，参差如画，可以备诗人之吟眺。而钟鱼馨板，经声梵呗，缭绕于晓风残照之间”。当地人相信“此寺于风水有裨”，请汤斌撰文记之。汤斌说，他并不相信风水之说，但是“州地最洼下，寺当河冲，岿然峻峙，有独障狂澜之象，形家言或不谬”。^④则寺庙的重建于当地人有世道重归于太平的意象。

由于元代有了这幅政治清明的面孔，元明易代之际的洪武皇帝，也在孙奇逢的眼睛里有了与我们通常所见异样的形象。自晚清以来，揭发种族革命，洪武皇帝朱元璋由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功绩，而在历史叙述中占有非比寻常的位置。在孙奇逢那里，这位高皇帝的伟大，则表现在承认圣人亦能出生于夷狄之地这一点上。“尝思宋亡于元，明祖驱之漠北，复我中夏，不以灭宋为元人之罪，而曰天命真人于沙漠，即位之明年，遂诏修《元史》，圣意渊微，未可尽窥。”^⑤“天生圣人于沙漠”，语出自洪武诏书。既然灭宋非元之罪，圣人可生在沙漠，同样的，明朝的灭亡也非清之罪，圣人也能够生在白山黑水之间。这样清朝的合法性，就不能仅仅因其“夷狄”的出身而受到质疑。

三、“公不出道不行，某亦出道不尊” ——“元初一清初”想象下“隐”的意义

在明晰了清初这一重归于治的面貌之后，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孙奇逢既然如此赞赏清初，为什么面对屡屡征召，他却选择了隐居？晚近以来的研究，习惯性地吧“隐”与拒斥、抵抗等姿态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对“隐”的理解，基本是建立在以江南为观测点的基础上。即便是以河南为研究对象的戴福士，在谈到孙奇逢的“隐”时也说，孙奇逢在被清兵掠夺家产之后隐

① 参见《寒松老人年谱》，《寒松堂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84页。

② 汤斌：《答张仲诚书》，《汤文正公（潜庵）全集》卷2，（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同治辛未绣谷丽泽书屋刻本，第335页。

③ 汤斌：《封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实》，《汤文正公（潜庵）全集》卷3，第622页。

④ 汤斌：《重修乾明寺碑记》，《汤文正公（潜庵）全集》卷1，第225—228页。

⑤ 《日谱》卷8，顺治十三年三月初八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718页。

退苏门，“1658年，在为失去家产而绝望多年之后，孙奇逢最终绝食而死”。^① 这里仍在暗示着抵抗的意味。

但是，孙奇逢果真做如是想吗？这岂不是与他对清初的认识相矛盾吗？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接下来将对孙奇逢所理解的“隐”稍作分疏。

在探究孙奇逢对隐的理解之前，这里先交代一个基本的事实：对孙奇逢的征召早在明季就开始了，他并没有接受明朝的征召。《征君孙钟元先生墓志铭》云：“两朝征聘十一次，□帛责于严谷，守令敦趋就道者数矣，先生高卧不起，故天下称为征君云。”^② 检诸《年谱》得在明时被举荐、征聘有：崇祯三年御史黄鹤岭疏请征聘、崇祯八年礼科给事中王正志保举、崇祯十一年兵部尚书范景文檄聘赞划军务。入清后有：顺治元年巡按柳寅东以地方人才荐、顺治二年刘馥佑、顺治二年薛所蕴举荐、顺治九年巡按陈棐举山林隐逸。^③ 仅此一事实，就提醒我们，不能在未加检讨的情况下，把孙奇逢坚辞征召，视为对清政权的拒斥。

下面回到对“隐”的意义的探究上。在前面提到写给魏象枢的那封信中，孙讲了一个许衡与刘因之间发生的故事。

宋元之际，道在许子。当年与静修同征，过容城，斋进止，静修曰：公不出则道不行，某亦出则道不尊。二子固各有所处也。

刘因，字梦吉，保定容城人，元初名儒。因爱诸葛亮“敬以修身”之句，名其居曰“静修”，世人也以“静修”称之。元初屡被征召，刘因坚辞不出，元世祖叹曰：“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元史》卷171有传。

刘因对许衡说的这番话中，揭示出“隐”所具有的另外一番意义。刘因的出发点，不是夷夏之防，而是势道关系。刘因之不仕，与其看作是拒斥“夷狄”入主的表达，毋宁视为平衡势道关系的巧妙策略。如果人人都一召即出，那么君主就会轻视儒生，连带着儒生所持的那个治理天下的道也不再受政权的尊崇。因此，在这里，刘因提出了儒生行动的两个策略，一是许衡这样出而行道，让君主看到儒家之道，在治理方面有着确实功效；另一个则是刘因这样隐而不仕，让君主知道，儒生自有一套行为规范，臣与不臣，非君王所可左右，从而达到尊道的目的。二者行事策略虽有不同，但共同的目标均在使儒家之道得行于天下。未可将“出”与“处”截然判为承认与拒斥的对立姿态，它们所关乎的是道的行与尊的问题。使儒道获得尊崇，这是“隐”所具有的一层含义。

“隐”所涉及的另一层含义，关乎时间。孙奇逢说：“出为帝者师，处为天下万世师。己一身不是小，正己物正，不论隐显穷达也。孔子修己以安人、安百姓，所谓正己物正。为帝者师在此，为天下万世师在此。”^④ 这里，“出”与“处”均为为师，只不过“出”是帝王之师，所影响者，在一代的时间范围中；“处”是万世之师，所影响者，将直达时间的尽头。

既然“隐”所关涉的是万世之久，那么对“隐”就有特殊的要求，非一般人所能为。在与弟子讨论“隐”的意义时，孙严格区分了“龙德之隐”与“石隐”的差别。弟子问道：历来的隐者栖身山林、行为怪异、面容枯槁，这样的隐居到底有什么意义？孙奇逢回答道：“有龙德者，然后可以隐。潜见、飞跃，岂有异道哉？”“龙德”出自《易经》“乾卦”，“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龙德”的特征是不随时代改变，也就是万世不易之道。只有持有这万世不易之道的人，才有隐的资格，才佩称得上“隐”。那么，哪些人有此资格

① 戴福士：《走向另一个唐朝或周朝？顺治时期中原人的观点》，载司徒琳《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的明清变迁》（上卷），第108页。

② 汤斌：《汤文正公（潜庵）全集》卷3，第554页。

③ 汤斌：《征君孙先生年谱》，第622、627、635、644、646、660页。

④ 《日谱》卷14，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867页。

呢？孙奇逢接着列出了一张他心目中合乎“隐”之资格的人物名单：

有出山之隐士，伊尹、傅说、太公、孔明是已。有归山之隐士，范少伯、张子房是已。

有以隐士出仍以隐士归，李长源是已。陈太邱、郭林宗、管幼安、陶渊明、王文中子、周濂溪、邵尧夫、刘静修不亢不悔，皆隐而蕴行之趣，未可与山林枯槁之士律论也。^①

弟子接着又提及严子陵，说：“严子陵为隐士之宗。有谓其遭时之泰，遇主之知，道既可行，身何以隐？”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既然儒家的理想是行道，那么在有了行道的条件之后，“隐”还有什么价值呢？对此，孙的回答是：“子陵而不隐，不过为际会风云时一邓禹、一寇恂耳。不臣，故人高尚其志。隐然以宾师自任，恶得为石隐者乎？”^②这就是万世师和一时师的差别。儒家所要保证的是，其所崇尚的道能够永久运行于天地之间。在有生之世，行道于天下固然重要，但是这不能以牺牲道永存于天地为代价。只有保住儒生“宾师”的地位，维持有德者不在天子位的局面，才能确保万世帝王对儒生心存敬畏，不敢任意驱使。

这是“隐”的第二层意义，为万世师。

“隐”能否视为否定当前政治昌明的意味呢？因为，儒家有“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行事标准。但这条准则在孙奇逢那里未必是绝对的。在与弟子讨论那个因尧一再要让天下而洗耳于颍水滨的许由时，孙奇逢说道：

巢、由是古来一种清净淡泊之人，以无所事事为荣，即皇王有道之世，亦不可少此一段风味，为天地留孤冷之气，自与邪道异端者不同。巢、由之后，再无巢、由，不必过虑其开石隐之嘲也。^③

这里，“隐”非但不与政权有丝毫对立的意思，反倒还是皇权政治的一个组成环节，且是三代般治世的表征之一。一个治世之中，如果缺少几个像许由、巢父这样不臣之人的存在，始终是不完美的。同时，对不臣是否能够容忍，也成了考核君王是否贤明的标准。这便是“隐”的第三层含义：治世的表征。

从上面所述来看，“隐”具有丰富的含义，并不是简单的拒斥姿态所能涵盖。它可能是尊道的策略，可能是万世师的考虑，也可能是治世的构成环节。就生活在清初的孙奇逢而言，隐居苏门的行为，至少包含着上述三层意思。一方面以不臣来实现尊道、传道，一方面同样以不臣表明治世的到来。从汤斌为其师九秩祝寿所写的序来看，孙的这一行动策略，颇为成功。其序云：“今气运剥极而复，兴朝定鼎，崇儒右文，先生读《易》百泉，韬光敛耀，静悟渊思，德益劭而学益邃。征书岁下，□帛屡贲严阿，至朝虚祭酒之席以待，而先生风隐愈高。公卿藩臬，拥簪到门，执弟子礼。”^④

四、结语

从以上对孙奇逢这一个案的分析，可以看到，身处同一时代的人，到同一历史资源中寻找自身位置，却得出不同的认识。江南士人在“南宋—晚明”的历史想象中抒发他们对明朝灭亡的哀恸，孙奇逢则从“元初—清初”的历史想象中获得了治世重临的希望。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异呢？这固然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有关。经历了明季北方战乱的孙奇逢，自然倾向于将明朝的灭亡视为王朝自身衰亡所致，清人入主则使世道重归于治。相反，对于迟至1644年尚处于逸乐之中的江南士人而言，清兵南下才引发了世运的转移，这一情形自然容易和“夷狄”污染中华大地的意象联系起来。由此也造成了双方对于清朝入主的不同理解。不过，就此处所关注的

①② 《日谱》卷9，顺治十三年十月初五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752—753页。

③ 《日谱》卷9，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757页。

④ 汤斌：《征君孙先生九十寿序》，《汤文正公（潜庵）全集》卷1，第167—168页。

问题而言，孙奇逢的事例提醒我们注意，无论士人还是儒学本身，均具有多重面目，绝非某个单一面相所能涵盖。“夷夏之防”固然是儒学的一个重要价值，但是，维护儒家社会秩序是与之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价值（如果说不是更重要的话）。士人会因为“夷狄”践踏儒家价值理念而对之心存抗拒。同样，士人也可能因为“夷狄”能够恢复儒家社会秩序而接纳异族的统治。何种可能性会转化为现实，均要视乎特定的历史情势而定，未可一概而论。过往从江南士人视角出发得出的认识固然十分重要，不过，如果我们过分依赖这个视角，会限制我们对历史复杂性的体认。对明清之际北方社会和北方士人的研究，揭示作为历史动力的北方在 17 世纪中叶的朝代更迭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或许能提供另外一条进入历史的途径，使我们对那场历史巨变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主要参考文献

- [1]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 [2] 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载《清代地方人物传记丛刊》1，扬州：广陵书社，2007 年。
- [3]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年。
- [4] 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 [5] 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下卷），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9 年。
- [6] 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 [7] 孙奇逢：《日谱》，载《续修四库全书》第 558—55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 [8] 汤斌：《汤文正公（潜庵）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
- [9] 汤斌：《征君孙先生年谱》，载《清初名儒年谱》第 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
- [10] 魏象枢：《寒松堂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
- [11] 萧一山：《清代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 [12]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

The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Yuan-Qing” and Northern Chinese Scholar-bureaucrat’s Idea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Example of Sun Qifeng

GUI T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guitao0121@ gmail. com)

The mainstream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which is grounded in the study of Jiangnan and the Confucians who upheld the principle of “Opposing the Barbarians,” always maintained an attitude of hostility toward the nomadic rulers from Northern China. But this attitude cannot provide a convincing explanation for the behavior of Northern China’s scholar-bureaucrat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Sun Qifeng, a Neo-Confucian Scholar active in Henan and Hebei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Sun constructed an historical analogy betwee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n his imagination, Confucian civilization was saved by the Confucian Scholars, such as Xu Heng, Yelu Chucai and Liu Yin, during the early Yuan Dynasty. Accordingly,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s regarded as a period of restoration. Furthermore, Sun had a unique behavioral ethic which was based on the balance of the emperor’s power and Confucian morality. According to Sun, becoming an official and resignation were the way of practicing Confucian morality.